



建筑格局是怎样形成的

□ 胡永嘉

1949年3月27日，马列学院（中央党校前身）学员和工作人员随中直机关迁往北平，暂住香山。9月30日，经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批准，将颐和园东门外的原清华大学农学院房产——西苑自得园移交给马列学院办学，后称“南院”。南院总占地面积约270亩，大部分是水面。马列学院将其简单改造后，于1950年正式入驻。马列学院进入时基本保持了原清华大学农学院的原貌，“飞机楼”用作教学楼，1—6号小楼（现81—86楼）住学员，大约20人一个房间。

由于所接收的校舍不能完全解决学工人员的办公和住宿问题，因此急需增建一部分办公室、宿舍、食堂等。1951年7月，根据刘少奇关于马列学院校舍建设意见并报请北京市政府批准，马列学院先在南院东南角盖了50间平房，同时在大有庄修建八排平房（原址在现22、23楼后马路北侧），以解决当年招生的急需。同时设立了“北院办公室”，负责北院教学管理工作。这就有了“先有八排房，后有党校北院”之说。

与此同时，出于办学规模和招生数量的长远打算，马列学院领导在完成临时性建筑的同时，还积极谋划新址，扩大校园，向北京市人民政府申请征用土地。8月，北京市政府同意马列学院在西苑大有庄北建设学校。根据马列学院建筑计划，全部建校基地约为215亩，其范围东邻骚子营，南以凹路为界，西以大有庄至佟家坟土路为界，北至佟家坟。

9月，马列学院再向刘少奇汇报，请求明确招生任务的同时，提出在南院扩充房子和修建图书馆问题。刘少奇在报告上批示：“暂时可只准备600学生的房子。以后要扩充时，再看情形决定。可能要

800学生，每年可毕业200多人。图书馆同意修建。”11月，刘少奇在给教育部长杨献珍的信中指示：“为使马列学院明年能收400学员，须再增建200人的房屋。请你即拟定计划，并报告周总理批准后，即着手准备，以便明年开春后施工。”1952年2月，中央批准了马列学院1952年度南院新建工程概算。3月底，完成施工图设计图纸后，经过对南院地质情况进行勘探，发现用于计划建房的地址地下水位太高，不宜在其上建筑房屋。于是报请中央领导同意后，马列学院改在南院北（小北院）修建办公楼、学员楼和一些教学生活设施。7月，北京市政府同意马列学院在西郊颐和园北，即方家胡同以北、辛庄以南用地36亩，作为建筑托儿所、医务所之用。这样，马列学院在绿杨宾馆东修建了幼儿园，在北院小东门修建了卫生科（校医院的前身），在北院修建了华北小学，作为党校的子弟学校，后改为北官门小学（现为中关村第一小学党校部）。

1953年6月，马列学院制定了《关于一九五三年下半年执行中央对马列学院建设任务指示的工作计划要点》。其中建筑校舍的任务部分明确：从1953年7月开始着手筹备全校校舍的建筑，计划五年内逐步建成可供1500个学员和与此相适应的工作人员所需的较永久性的各项建筑物。当年，马列学院在南院相继建成图书馆（87楼）、办公楼（88楼）、研究楼（89楼）和一些平房，并在原有山水的基础上，对南院的湖岸进行修整，从颐和园“谐趣园”引入湖水，至研究楼前的一个小湖，再顺着稻田流入大湖。在湖上建了一座石桥和一座拱桥，并修了驳岸。此外，还在南院西部建起了礼堂和能容纳300人就餐的食堂。在小北院建了苏联专家楼（91楼），后改为马列学院的教职工住宅。同年，还在小北院东面征地，修建了三栋学员楼。

1954年，马列学院在南院一至六院平房安装了暖气，在83楼后建起了锅炉房。同时，还翻建了礼堂，改建了南院的北大门。

1955年5月，马列学院北院校舍建设计划经前后两年三次修正后报中央和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中央和国务院同意了计划，并核定暂在校学员3000人，工作人员1600人计算，新建房屋总建筑面积15万平方米，投资2700万元，全部任务分三个年度完成。

1955年8月，马列学院更名为中共中央直属高级党校（简称中央高级党校）。1956年中央高级党校新校舍建设总体规划及预算重新上报国务院并获批，总建筑面积为16万平方米。总体规划根据中央高级党校的性质、教学任务、教学方法、培训任务以及校址的地理环境等多方面内容制定的。近期规划是要建成满足3000名学员以及1500名教职工学习、生活和工作需要的校舍；远期规划是要逐步扩充至容纳学员5000人、包括工作人员可达10000人规模的校舍。为了做好这项工作，学校专门成立了校舍建筑委员会，商讨规划并协调施工事宜。委员会以中央高级党校校长杨献珍为主任，并有中央办公厅、北京市机关房屋管理局、中直管理局及本校有关领导组成，共计16人。至此，北院正式动工兴建。

中央高级党校校园建设总体规划的制定充分考虑了学校培训对象的特点，拟定每人一间宿舍兼自习室。北京市规划局根据党校的职能需要，定位是因为离城市中心比较

远，批准建筑密度可以放宽，教学区和学员区不超过20%，住宅区为25%，而且校园内可以留有较大的绿地和广场。校园建设任务下达后，北京工业建筑设计院根据中央高级党校提出的要求制定了北院校区建筑总体布置、设计要点和总平面初步设计方案。担任规划设计的总设计师是我国著名建筑大师戴念慈。这是对中央党校现址的第一次全面规划。

由于新校址毗邻颐和园，设计者在制定校园建设总体规划时提出的设计理念是党校建筑、园林既要充分利用原有地形和实际环境，又要建成以颐和园为主的宏观景区的有机组成部分。校园建设的总体布局是围绕一条自颐和园万寿山景福阁，自南向北长达1100多米的中心轴进行。这条中轴线当年测定为正子午线。党校的正门、主楼、大礼堂、原大白楼等重要建筑自南向北依次排列，其他建筑如图书馆（现美术馆）、陈列馆（现校史馆）及各个学员楼左右对称、群相呼应，构成错落有致、排列井然的校园建设布局。校园建设的总平面布局则采取了传统的建筑布局方式，遵循“方便、合理”的原则和“适用、经济、美观”的方针，既要紧凑以节省用地，又要灵活自然，避免呆板。

在这样精神的指导下，1957年—1959年，学校建成了大礼堂，总建筑面积1.2万余平方米；1958年—1962年，建成教学和机关主楼，总建筑面积2.3万余平方米；1958年—1962年，建成图书馆和陈列馆，总建筑面积分别为6千余平方米和3千余平方米；1957年—1961年，建成甲种学员楼（22、23楼），为研究班学员使用。1958年—1962年，建成乙、丙两种学员楼21栋（1—21楼），为普通班及师资班学员使用。每栋建筑面积2千余平方米。1957年—1963年建成体育馆，总建筑面积近3千平方米，能容纳200人运动。1958年建造了东、西食堂，1962年又新建了北食堂，均为二层，每栋建筑面积2千余平方米，各能容纳600人就餐。1963年3月，党校开始兴建北院人工湖景区。人工湖湖水引自颐和园后湖船坞处，通过暗管横穿颐香公路，经党校南围墙流入人工湖小水池——停留湖，湖水随地势向北流入湖区，再从校园西北出围墙流入北旱河。10月，人工湖初具规模，总面积2.5万平方米。此外，从1956—1963年，中央高级党校还建造了25栋职工住宅楼，保障了教职员工的 basic 生活需要。

这样，在1963年前后，中央高级党校北校区（包括南院、小北院和北院）校园格局基本形成，共占地约1200亩，总建筑面积达16万平方米。并在校园内形成经线5条、纬线6条的方形道路路网。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各方面都很困难的情况下，由于党中央高度重视，由于马列学院（中央高级党校）领导班子的积极进取以及全体干部员工的勤奋努力，从1950年到1963年，马列学院（中央高级党校）形成了一个校园建设的小高潮，基本上确定了延续至今的校园格局，为党的干部教育事业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办公厅校（院）史编辑办公室〕



孟子论“君子之仕”与“君子之廉”

□ 何山石

世人喜欢孔、孟并举，更以“亚圣”称誉孟子，意在强调孟子对孔子思想的继承、对儒家道统的维护。但是，在探索孟子关于政治的观点与实践时，更应该关注孟子对孔子思想继承之外的独特性，例如，孟子对“君子之仕”与“君子之廉”的理解，就更为深入。

通读《孟子》全书，明显能感受到，孟子并没有像孔子那样，直接就君子进行诸如“君子不器”“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的描述。这样的警句，在《论语》中平常习见，但在《孟子》中，则是稀有之语，如《孟子·离娄上》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舜不告而娶，为无后也。君子以为犹告也”，此类表述在《孟子》一书中并不常见。

孟子更注重对君子政治内涵的阐发，甚至直接讨论君子与“仕”之间的关系，这是孟子对君子内涵理解的鲜明特点，值得深究。

在《孟子·滕文公下》中记载，当一个叫周霄的人问孟子：“古之君子仕乎？”孟子直接回答：“仕。《传》曰：‘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出疆必载质。’公明仪曰：‘古之人三月无君则吊。’”孟子认为，君子要出仕为政，为国出力。而且，孟子接下来对周霄说：“士之失位也，犹诸侯之失国家也。”孟子认为，如果君子失了自己的位置，失去了为国出力的机会，其性质等同于诸侯丧国失家，成为无根之人。不出仕，君子将不再是君子。可见，孟子非常看重君子的政治身份，他对君子的界定，一个重要的维度是将治理国家的责任赋予了君子。

《孟子》一书中，对“君子之仕”论述最集中的，是《孟子·万章下》和《孟子·告子下》。在《孟子·万章下》的第一章中，孟子便指出伯夷、伊尹、柳下惠、孔子等为“仕”的原则：伯夷是“治则进，乱则退”，即天下太平就为官，天下动乱则隐退；伊尹是“治亦进，乱亦进”，即不管天下治理得好坏，都为官；柳下惠是“不辞小官”“进不隐贤，必以其道”，即不嫌官位小，不隐藏自己的才能，按原则办事；孔子则是“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即在任何情况下，顺势应时，能做官就做官，不能做官就停止。而在《孟子·告子下》中，不仅重提伯夷、伊尹等古风君子之仕，而且在回答“古之君子何如则仕”时提出“所就三，所去三”的原则，即君子为官的条件是，君主要对君子尊重、讲礼节、说话算数，否则就弃官而去。其实，伯夷、伊尹、柳下惠、孔子等人，均是中国古代君子的代表，他们为国而仕，仕而有节，所以，孟子说：“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闻柳下惠之风者，鄙夫宽，

薄夫敦”。当然，《孟子》这两章，更加集中论述的，还是“君子之仕”，当合乎礼，合乎义，合乎仁。

孟子更值得肯定的地方，在于他重视君子政治品格的同时，又直接将“廉洁”纳入考量标准，也由此将“君子之仕”很自然地延伸至“君子之廉”，使这一思想逻辑具有更加丰盈的内涵。

在《孟子·滕文公下》中，齐威王的将军匡章问孟子：“陈仲子岂不诚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无闻，目不见也。井上有李，蠹食实者过半矣，匍匐往，将食之；三咽，然后耳有闻，目有见。”匡章认为陈仲子是个“廉士”，即是个廉洁君子，他住在於陵这个地方，几天没有吃饭，饿得眼睛看不见、耳朵听不见，最后，将金龟子的幼虫吃剩的李子吃掉，才稍稍恢复。为什么陈仲子饿成这样呢？孟子在后文作了解释：“仲子，齐之世家也。兄戴，盖禄万钟，以兄之禄为不义之禄而不食也，以兄之室为不义之室而不居也，辟兄离母，处于於陵。”原来陈仲子即田仲，出自齐国最有影响的家族——田氏家族，这个家族最后完全掌控了齐国政权。田仲认为他的哥哥田戴虽居万钟之爵，但为人不义，自己羞与之为伍，既不食田戴之禄，亦不居田戴之屋，所以才陷入如此窘境。匡章认为陈仲子是位廉士，但是，孟子却完全不赞同这种说法，他说：“于齐国之士，吾必以仲子为巨擘焉。虽然，仲子恶能廉？充仲子之操，则刳而后可者也。夫刳，上食槁壤，下饮黄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筑与，抑亦盗跖之所筑与？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树与，抑亦盗跖之所树与？是未可知也。”孟子认为，陈仲子算不上是廉洁之人，因为陈仲子除非像蚯蚓一样，才可以真正在物质上与这个世界的联系做到最少。陈仲子住的房子，能保证一定是伯夷这样的人所建而不是盗跖这样的人所筑吗？陈仲子吃的粮食，又一定是伯夷这样的人所种而不是盗跖这样的人耕作所获吗？所以，陈仲子的衣、食、住、行，到底哪些方面与贪污之人有关系，完全说不清楚，这不是判断一个人廉洁的标准。

所以，廉洁的内涵，在孟子那里是有严格的判断标准的。从上述对话可以看出，孟子对陈仲子的评价，并不过多关注陈仲子独善其身的道德表现，他认为，这种独善其身，不仅是不完全兑现的举动，更为重要的是不会对当时的国家廉洁治理带来实质性的影响。将是否能够对国家廉洁治理带来实质性的作用，作为“君子之廉”的判断标准，正是孟子务实思想的直接体现。

孟子是极为务实的思想者，孟子谈为政，较少空谈，都落在实处。如



在《孟子·梁惠王上》中有这样的描述：“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又如《孟子·尽心下》言：“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可以说，这样的描述，《孟子》一书中随处可见。孟子谈为政，都涉及这些细腻的、温暖的层面，关注的都是民生实事，是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所以，读《孟子》，扑面而来的，是人间烟火气息，孟子需要的是实实在在的为政举措，他当然会批评甚至否定陈仲子不能兑现的独善其身。

其实，孟子主张的仁政，最重要的品格就是“实”政。孟子崇实，所以反对“虚行”，更反对“乱行”，即乱作为，这也可视为孟子为政思想的最重要特征之一，能体现其对“君子入仕”的理解，也能体现其对“君子之廉”的预期。如在《孟子·离娄下》，孟子对子产为政行为的评价：“子产听郑国之政，以其乘舆济人于溱、洧。孟子曰：‘惠而不知为政。岁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舆梁成，民未病涉也。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济之？故为政者，每人而悦之，日亦不足矣。’”子产用自己的车，渡人过河，也是亲民之官。但孟子觉得，与其天天渡人过河，不如修好桥，一劳永逸地解决百姓过河难的问题。孟子说子产“惠而不知为政”，就是说子产解决老百姓的心是“惠”的，但不知道如何有效解决问题，就是“不知为政”，是乱作为，而乱作为，也是一种为官不廉！

所以，孟子论君子之廉，以客观的为政效果为依据，这又是孟子思想的杰出和独到之处。



念 崞 阳

□ 赵海星

从山西原平出发，一路向北，汽车颠簸在黄土飞扬的故道上。记忆中的城门逐渐清晰，这就到了崞阳古城。

我曾在烟雨氤氲的周庄古镇寻访，在红叶尽染的北水镇漫步，在霓虹闪烁的丽江古城夜游，这些古镇、古城都是那么华丽、盛装……，然而在我的脑海里却永远藏着这样一座城，凝重、沉默，像老兵一样带着深入骨髓的倔强。

儿时仰望的城门已是破败不堪，砖石散落，夯土裸露，杂草丛生，城墙残段满目伤痕。只有门洞上方镌刻的“宁远”二字依然清晰可见。崞阳古城有四个城门，东名“临沱”、西名“保和”、南名“景明”、北名“宁远”。宁远门是北门，门洞纵深十米有余，地面青石板磨得发亮，印刻着几道深深的车辙，风穿城门而过，猎猎旌旗、萧萧车马声犹在耳，依稀可遥想当年融通塞北的辉煌。

史载，崞阳古城设县治历史久远。西晋怀帝永嘉四年开始建置崞城，北魏为石城县治，隋为平寇县治，后为崞县治，此地为晋北锁钥。

我信步而行，道路两侧明清时期的旧宅老屋多已残旧，三两老人靠着墙根抽着旱烟，街边小摊的油炸麻叶散发着的香甜味，古老的事物缓慢转动着时光的韵律，一切既熟悉又陌生。

古城尚有文庙、普济桥、关帝庙、岱山庙、城隍庙和龙王宫等景观遗存，历经风霜的洗礼和时光的漫漫，这些古建悠然而肃重地伫立在那里。文庙是我小时候经常玩耍的地方，推开大门进去，大成殿、棂星门、泮池这些中轴线上的主体建筑依旧存在，院子里古柏古松绿荫如盖，儒雅风范浸润表里。

摩挲着岁月的痕迹，尘封的记忆一点点鲜活起来。我姥姥家住在崞阳的乡下，孩提时父母忙于工作，就把我放在姥姥家。姥姥待我极亲，每年冬天大雪纷飞的时候，她都会给我做棉袄棉裤。那几天天不亮她就出门，挎着小竹篮去赶崞阳早集，精心挑选布料和棉花。她用的是老式缝纫机，飞轮旋转起来，针一上一下，发出咔嚓咔嚓的声音，不一会儿就做好了。姥姥手极巧，裁剪得也好，做的衣服很合身，每次她做衣服的时候，我就

美滋滋地在旁边等着盼着。母亲在铁路工作，每周末会从外地来看我。周五的时候我就会站在村口，眺望着重方的铁轨。当看到蒸汽机车冒着蒸汽呼啸而来的时候，我就知道母亲回来了。每次她都会给我带几个苹果，每天能吃一个。一身新衣服，一个苹果，就是我对那个物质匮乏的岁月中故乡和亲人温暖甜蜜的记。

西沉的夕阳把我从记忆中唤醒，倦鸟归巢，游子归乡。回过头来看，那个城门虽然依然破旧，但却在光影须臾间勾勒得更加清晰，犹如穿梭时空的隧道，一头连着过往，一头连着未来。成年之后，离开故乡，到过许多城，见过许多风景，也曾徜徉于诗和远方，但当心灵沉静下来的时候，最惦念的还是“万里还乡未到乡”。

原来，怀念崞阳古城，怀念的是那无可消除的乡愁。

